

“消失”的圣徒

周程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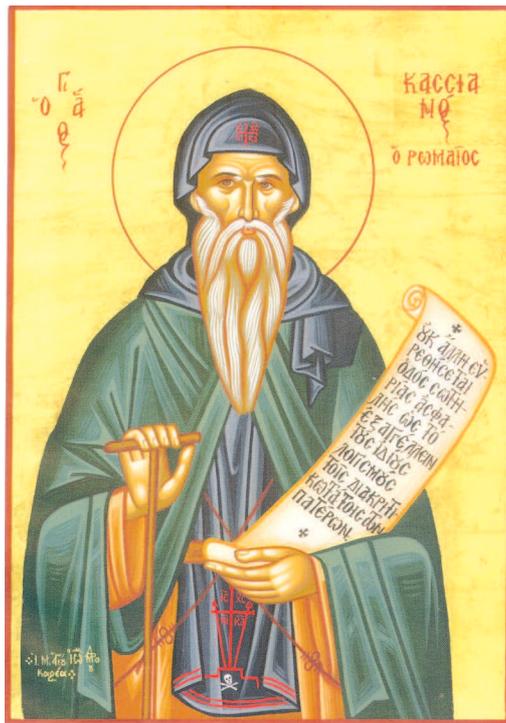
卡西安生活的时代正是希腊、拉丁两种语言地位更迭的转折时期，他的修道思想被其灵感来源——东方的修道院所接纳，经历了从拉丁语到希腊语的翻译，是为一种文化反哺。所以真正的卡西安从未“消失”过，梅黛奥拉抄本就是存在的明证之一。而察马里斯坚持认为母语为拉丁语者不可能熟练使用希腊语，拉丁语作品也不值得被译成希腊语。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他对材料的判断和使用，也折损了其核心观点的有效传达。

公元 386 年左右，青年修士约翰·卡西安（John Cassian）和他的同伴正从伯利恒经水路到达埃及港口城市塞尼苏斯，目力所及是大片的海洋和盐湖，迥异于他们后来看到的沙漠景致。这位西欧修道制度的奠基人不会想到，1600 多年后，自己竟然被“消失”了：2012 年，希腊学者、亚里士多德大学哲学系教授帕纳约蒂斯·察马里斯（Panayiotis Tzamalikos）出版了两部著作，分别是《重访真正的卡西安：6 世纪的修道生活、希腊教化与奥利金主义》（*The Real Cassian Revisited: Monastic Life, Greek Paideia, and Origenism in the Sixth Century*）和《一位新发现的希腊教父：被马赛的约翰·卡西安遮蔽的撒巴特的卡西安》（*A Newly Discovered Greek Father: Cassian the Sabaite Eclipsed by John Cassian of Marseilles*）。在这两本书中，他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，即所谓的“西方修道主义之父”约翰·卡西安是一个中世纪伪造的人物，其原型是一位 6 世纪早期巴勒斯坦地区的修士——撒巴特的卡西安（Cassian the Sabaite），而传统上归于约翰·卡西安的《要则》（*De Institutis Coenobiorum*）、《对谈录》（*Conlationes*）等拉丁语作品，其实是后者所写的希腊语原文的译本。

正如上世纪许多新的发现重塑了我们对早期修道文本和权威的理解，这两本书的作者亦怀有类似抱负。因其结论的颠覆性，两书甫一面世便激起了不小的波澜。然而，这终究是不可多得的学术创新，还是站不住脚的刻意证伪？

另一位卡西安

一般认为，作为“一种规范集体或单身宗教生活中苦行和沉思方式的机制”，修道主义最初发轫于 3 世纪的埃及沙漠，经历了从个人隐修到集体修道



约翰·卡西安 (John Cassian)

的组织方式转变，后由阿塔纳修（Athanasius）、卡西安等教父传播至拉丁西方。6 世纪初，著名的《本笃规章》（*Regula Benedicti*）问世，标志着西欧修道制度最终确立。由于《本笃规章》中多次援引《要则》和《对谈录》描述的修道生活准则，将之奉为“修德的指导工具”，因此其作者卡西安也被冠以“西方修道主义之父”的头衔。据欧文·查德威克等学者考证，卡西安于 360 年左右出生在小斯基泰地区（今罗马尼亚境内），早年在伯利恒修道院出家，386 年左右前往埃及接受沙漠教父的训练，后来去了君士坦丁堡和罗马，410 年，西哥特人洗劫罗马，他又被迫辗转至马赛，最终定居于此。在接下来的二十余年间，他在当地著书立作，先后建立两所修道院，于 435 年左右去世。

这样一份清晰、自洽的履历，被察马里斯打上了问号。事情源于 1908 年在希腊梅黛奥拉的基督显圣修道院（包括它在内的梅黛奥拉修道院群坐落于高耸的岩石山顶上，是东正教修道中心的典型，有着“空中修道院”之称，如今已成为知

名旅游景点）发现的一份编号为 573 号的希腊文抄本，这一抄本形成于 9 或 10 世纪，有着将近 300 页的篇幅，主要内容是《启示录》评注（*Scholia in Apocalypsin*）。自面世以来，学者们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这份评注的作者身份问题上，多数猜测指向奥利金（Origen）。作为奥利金研究专家，察马里斯在一个世纪后接触到了这份抄本，起初他认为作者是狄奥多莱（Theodoret of Cyrhus），但随着对评注以外的最后 45 页文本的重新审视，他意识到这一小部分内容是广为人知的《要则》和《对谈录》的缩略本，而封面上的标题“卡西安修士之书”（*Κασσιανού μοναχοῦ βιβλίον*），标题下方的一行引介“由罗马修士卡西安所写，献给卡斯托主教，主旨是关于东方和埃及的修道规范和守则”（*Κασσιανού μοναχοῦ Ῥωμαίου, πρὸς Κάστορα ἐπίσκοπον, Περί διατυπώσεως καὶ κανόνων τῶν κατὰ τὴν Ἀνατολὴν καὶ Αἴγυπτον κοινοβίων*），以及最后一页上的补充“罗马修士卡西安”（*Κασσιανού τοῦ Ῥωμαίου*

μοναχοῦ，此处少了一个 σ ），都强化了这份抄本与卡西安之间的联系。此外，抄本中还夹杂着 90 多页出自至少五位作者的内容。面对这样一份繁复庞杂的文本，察马里斯发现除了《要则》和《对谈录》的希腊语译文缩略本，其他都是抄自狄迪穆斯（Didymus the Blind）、克莱门（Clement of Alexandria）等东方教父的希腊语原文，由此，他不禁对标题中“卡西安修士”的身份产生了怀疑。他指出，假使这位卡西安真的将东方修道传统传播到了西方，那么东方地区的抄工有必要抄写其拉丁语作品的译文吗？这些内容本就属于东方传统范畴之内，何不直接引用希腊语原文？还是说所谓的译文，其实正是原文？更进一步，“卡西安”确实是游学埃及、定居马赛、用拉丁语写作的约翰·卡西安吗？还是另有其人？

巧合的是，另外一位“卡西安”，真的被找到了。在 6 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的修士西里尔（Cyril of Scythopolis）的《圣撒巴传》（*Vita Sabae*）中，察马里斯发现了一个名叫 *Κασσιανός* 的人，与“卡西安”（*Κασσιανός*）拼写相近，更是完全对应梅黛奥拉抄本（Ms 573）末页上的人名。根据西里尔记载，他是自己的同乡，曾先后担任苏喀修道院（the monastery of Souka）和撒巴的大劳拉修道院（the Great Laura of Sabas）院长，因此察马里斯称他为“撒巴特的卡西安”。此外，这个名字还出现在 536 年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的奉献者名单里，他被列为“撒巴的劳拉修道院的长老和修士”，印证了西里尔的说法。

凭着这些少数的迹象，察马里斯建构出了一位新的基督教知识分子的传记：公元 475 年，撒巴特的卡西安出生于巴勒斯坦的西托波利斯（Scythopolis，即《圣经》中经常提及的伯善），他在君士坦丁堡久居，继承了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神学传统，担任过两所修道院院长，于 548 年在撒

巴的劳拉修道院去世。他用希腊语写作，除了梅黛奥拉抄本中的《要则》和《对谈录》之外，还有原来假托狄迪穆斯的《论三位一体》（*De Trinitate*）等作品传世。在此基础上，察马里斯断言，约翰·卡西安不过是个虚构的人物，“现在，是时候去倾听这位撒巴特的卡西安的声音了！”

上述便是《重访真正的卡西安》和《一位新发现的希腊教父》的主要工作。这两本书于同年出版，前者侧重推论“卡西安”的真实身份，后者则是对梅黛奥拉抄本最后 45 页文本的编纂和评注。在《重访真正的卡西安》开篇，察马里斯坦言：“我意识到，我所定义的‘一位作家的复活’是不易为当下学界接受的，尤其是那些研究所谓的‘约翰·卡西安’的人。这位拉丁作家获得了普遍的宗教忠诚，一些学者将他定义为‘连接东西方修道主义的桥梁’。”但他强调自己并不怀揣这种忠诚，“只希望做一个精细的学者”。

这种“精细”体现在第一章“推翻与约翰·卡西安相关的证据”的论证方面。约翰·卡西安的名字、事迹常被同时代人和后世学者提及，“消灭”他的前提就是否定这些引述。察马里斯指出，5 世纪的马赛人跟拿丢（Gennadius of Marseille）在《名人传》（*De Viris Illustribus*）中对约翰·卡西安生平の詳細记载是后来添加的；奥古斯丁的拥趸普罗佩（Prosper of Aquitaine）在《驳对谈录》（*Contra Collatorem*）中没有回应关于《对谈录》卷十三的主要争议；主教帕拉底乌斯（Palladius of Helenopolis）提到 402 年“虔诚的日耳曼努斯神父和卡西安执事”前往罗马为约翰·克里索斯顿求情，这里的“卡西安”是指另外一个人；9 世纪拜占庭藏书家佛提乌斯（Photius）说卡西安是“一个修士，家乡在罗马”，此处的“罗马”是指罗马帝国内，并不仅

（下转 8 版）➔